

技术主义道路与传统文科的发展路向

张福贵

摘要:“新文科”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思考路向。一个是“新的文科”，一个是“文科之新”。前者是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角度，创立和形成新的文科专业或者方向；后者则是从传统文科自身发展的角度，反思和调整现有文科的发展路向。“新的文科”不单纯是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扩展和融合，而最根本的是更新学科观念和创新学术思想、培养创新的人才。“文科之新”是文科特别是传统基础文科的自我革新和反思，通过融入新技术来实现文科的健康发展。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降，人类文明的几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而每次浪潮袭来时也几乎都是人文学科向技术致敬和靠拢，尽可能从中认领份额和寻找空间。然而，“打破学科界限”不等于消除学科属性，融合应该是以我为主，以此来强化人文学科的功能与价值。对于有些传统基础文科来说现在不是急于如何“新”，而是思考如何“旧”，甚至是如何回归传统和原点。同时，要将“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医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思考各个新学科之间融合之后的新。

关键词:新文科；“新的文科”；“文科之新”；技术主义；原点经典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5.015

“新文科”已经成为当下学界和社会流行的热词，但如何理解和阐释“新文科”的概念和内涵并不轻松。近年关于“新文科”问题的讨论轰轰烈烈而日渐深入，虽说答案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仍有很多成果与创见。这种不确定和分歧，恰恰说明新文科建设有一个广阔的空间，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对于“新文科”的讨论，在线性发展观下的探讨之外，也可以做一下非线性发展观性质的探讨。所谓的“新文科”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思考路向：一个是“新的文科”，一个是“文科之新”。前者可以说是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角度，创立和形成新的文科专业或者方向；后者则是从传统文科自身发展的角度，反思和调整现有文科的发展路向。

“新的文科”：人类思想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与创新

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相适应，“要着力建设交叉融合新专业(新方向)。要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探索建设适应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专业(新方向)，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①。”这是当下对于“新文科”内涵的一种最为普遍和经典的理解，抓住了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新学科的创立来自于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也就是文科对于科技产业领域新动向的一种反应。说到底，这种反应是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过程。因此，“新的文科”的产生就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惯性反应和自然调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新思潮等技术理论与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多层面渗透，“科学、艺术与人文之间不断呈现出集成创新、融合发展的交叉化发展态势，人文学科正以新的视角，动态吸纳与整合着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展现出了全方位开放的胸襟与姿态，学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断涌现的具有典型文、理、工、艺交叉属性的‘数据新闻’‘大数据与智能媒体’‘数字媒

作者简介:张福贵，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新文科工作组成员(长春 130012; zhangfg@jlu.edu.cn)。

^①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育》2020年第5期。

体艺术’‘动画艺术’‘游戏设计’等专业正呈现出典型的新文科专业特性,推动着学科知识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与艺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深度融合,并不断为社会新文化、新业态、新思想提供了创新源泉与动力”。^① 所以,文科之新是势在必然。

科技与人文本质上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二者的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分工和学科的分野使二者越来越趋于分离乃至分裂,在某些方面甚至对立。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不是孤立和片段的文明事件,而是有着前因后果的连续过程。传统学科通过跨学科和融学科而产生新的学科专业或者方向,也不单纯是一种知识的扩展和结构的调整,而是如何通过这种扩展和调整来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最终完成新的人才的培养。所以,新文科首先在于更新学科观念和创新学术思想。如果仅仅从知识层面对新文科进行结构性静态分析的话,就会导致新文科建设中的单纯知识化、技术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当代的趋势是,‘知识分子’从一种人格主体承担的身份名词开始向一种活动机制和功能场域演化。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动词,突出表现为一种活动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当代把传统知识分子原来承担的专业知识与道义良知等内涵,逐步变成了相应内涵的社会功能活动架构或平台。”^②

中国当下的文科学科体系从横向结构来看,可以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从纵向渊源流脉来看,又可以分为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而基础学科与传统学科、应用学科与现代学科的内涵两两相互重叠,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文科学科体系的基本形态。当人们在讨论“新文科”问题时,往往更多的指向基础学科和传统学科。受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学科从观念到方法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相对于传统基础文科,现代应用文科本身就具有“新的文科”的属性,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如何更新依然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话题。“交叉有三层意思。首先是知识交叉,它意味着学者们要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很精通,样样是专家,但他要对多个领域有了解,可以进行多学科的思考。其次是思想交叉,即我们要确信在当今这个时代,交叉是方向,理工医农是这样,文科也是这样,各科学者都抱着交叉的理念,才能树立交叉的思想。第三是方法交叉,即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文科研究,如果不采纳理工科的研究手段、思维方式和仪器设备,已经不容易深入了。”^③这是当下人们对于“新的文科”属性的普遍认识。

“新的文科”的出现,首先是打破固有的学科理念和学科边界,带来一种学科理念的创新,没有这种新的学科理念,也就不会有新的文科的出现。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指出,“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须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④ 一些学术领域或学者受传统学科专业观念的制约,以所谓“术有专攻”为基本考量逻辑,对于学术研究中出现的跨学科专业的现象,常常以“越界”或者学科方向“不规范”来加以限制,甚至中断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探索。毋庸置疑,学术研究首先考量的应该是此研究是否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具有创新性价值,而不是研究者的专业归属和研究问题的学科领域。学科有边界,而学术是没有边界的。对于学者的研究行为首先要判断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而不是学者的学科身份和社会身份。这不只是人类思想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学者的话语权利。

其次,“新的文科”不同于其他新学科,其不只是文科与新技术、新方法的融合,而是最终目的是如何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和新的人才。所以,新文科本质上是思想的创新和人才养成。反映在文科

① 廖祥忠:《探索“文理工艺”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范式》,《中国高等教育》2020年第24期。

② 尤西林:《“知识分子”:专业与超专业矛盾及其改善之道》,《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③ 钱乘旦:《中国文科为什么交叉,且必须交叉?》,《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

④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发布》中国教育在线2020年11月17日。

教育环节就是培养具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现代文科人才。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指出,“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传统性与时代性是相连的,连接点是思想文化的创新。有了思想文化的创新,学科融合或者学科交叉最后的结果才可能不是 $1+1=2$,而是 $1+1=N$ 或者 $1+1=1$,这是“新的文科”的产生效应。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既是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前提,也是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目的。作为知识与思想的关系来说,是一个互为促进的过程。“新的文科”最显眼的是知识结构的扩大和融汇,这对于新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思想的土壤是知识,一个知识点可能产生一种思想,两个以上知识点可能就会产生两个、三个……以上的思想。知识是一种网络结构,思想存在于每个网格的结点上。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的知识具有不同的谱系,但是不同谱系之间仍然有着若干先天的重合和融合。而文科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一种产物,本身就具有共通性。“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看,理性具有现代性走向,古典文化也最终要走向现代文化,因此应该以现代性为参照,在历史发展的现代性上给中国文化定位,也就是考察其理性发展的程度和水平。”^②任何一个学科专业的分类都是相对的,而且对于基础文科来说,这种分类又必须适应至少顾及到中国传统文科的特点。

说到底,无论是“旧文科”还是“新文科”,都是不同时代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思想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科也就不断地由旧变新再变新。在这样一种逻辑下,“新的文科”的创立并不是文科发展的终点甚至不是暂时的终点,而是前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和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从这一思路出发,预示着新文科需要与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医科的再次融合。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这“四新学科”的讨论大多是专业性甚至是孤立性的,没有能够从“四新学科”之间的融合角度进行整体考量。新学科不只是从自身已有学科体系的融合变革出发,而是要从新文科与其他新学科跨界、融合的视角来思考新文科的深层含义。新文科与新工科的融合不仅限于与传统工科的融合,而是要和前沿的新工科融合成为新“人文工程”方向,还有网络传播学与大数据的融合所形成的数字人文、实验语言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所形成的计算语言、工程与社会学融合所形成的工程社会学、航空与心理学融合所形成的航空心理学等新领域、新方向。

“文科之新”:传统文科的向前发展与向后回归

“新的文科”的建设是线性发展观下正向的思路,而“文科之新”除了这种正向的思路之外,还要有反向的建设思路。在“新文科”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新”与“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联系。不一定只有“新建”或者“跨学科”才是“新”,相对于有些学科特别是传统基础文科来说,回归传统和回归经典也是“新”。因为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下,“不读原著”“不读经典”已经成为许多基础文科学生的通病。如何将各种“新”学科之间做通盘考虑,互为联结贯通,是更大的“新”。这是我们对于“文科之新”的完整考量。

国家启动“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就是要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世界一流”不可或缺的就是一流的基础学科建设和一流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近日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中明确指出:“考察建设高校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

^①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5月10日。

^② 杨春时:《论中国文化的理性有效理性特质》,《学习与探索》2020年7期。

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情况”^①。“双一流”建设既要着眼于当下国家战略急需和世界前沿科技,又要强化“从0到1”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导向。然而,长期以来,“有所为有所不为”已经几乎成为所有学校发展改革的口号和思路,而这个思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造成急功近利的选择:单纯从当下的就业市场、地方经济急需和量化评估机制等方面进行考量。一些不能立即见效的基础专业被边缘化甚至取消,而这已经成为各个高校近年来普遍的选择思路和实际操作。

要知道,社会需求的热点不是一成不变的,热点不仅是阶段性的,而且也是结构性的。从阶段性来看,有热的过程也必然有冷的过程,冷热是必然会发生转换的;从结构性来看,有主流专业,也有非主流专业;从社会需要来看,有硬性的需求也有软性的需求。坚持冷中守正热中创新,才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根本。因为人类自身发展就是一种全面发展,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甚至快乐需要都不可缺少。今天回头看,外语、外贸和法律等诸多当下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当初都是社会最热门的专业,也是多数院校“有所为”的专业。而近些年一拥而上的“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工智能类专业和学生数量大大超出了实际需求,最终也势必会重蹈覆辙,一些学校已经停止招生。这足以证明,盲目的追逐社会热点,必然导致专业设置的大起大落,一拥而上必然是一哄而散。

“文科之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文科要向前发展,由旧变新。“文科之新”是相对于“文科之旧”而言的,那么学科新旧究竟差别何在?我认为除了要有创新的学科观念之外,更要有创新的学术思想与新的人才。而且学科融合发展是有主有次有限度的,“文科之新”不能脱离美善人性的根本。“文科之新”首在思想之新,通过学科融合形成新的思想,通过新的思想培育新的人才。单纯的思想重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思想的创新,进而提升民族思想的质量,增加人类思想的容量。没有新的思想,就没有真正的新文科。所以,文科自身的新,要有新的学科意识,着眼于学科跨界、完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而不单纯是新建文科和简单的学科交叉。新文科的关键不是重组而是创造,不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方法而是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新人。旧文科向新文科转换不是困境的突围,不是用新手段工艺把原有的知识和数据重复一次而已,而是创造一种思想创新机制,科学不能成为纯粹的技术和手段。这里涉及到传统文科发展与技术主义道路选择的深层关系。

必须承认,信息爆炸而缺失经典是当下融媒体时代一种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已经极为鲜见。无论是工业革命、电子时代还是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几次巨大进步都是以新科技为先导的技术主义的胜利,市场、技术成就了经济大国、现代国家和军事、政治的强权。继大数据之后,近年大热的人工智能又成为了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浪潮。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新增专业目录统计,2019年和2020年共新增人工智能专业310个,新增“智能”类专业651个。国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智能专业毕业生?这么多的新增专业是否有足够的合格师资数量?在这种新浪潮冲击下,人文学科的本质功能和历史使命在没有完成时,就被技术主义裹挟而半途而废。科技与人文本来是融合的,但科技是有层次和类型的,因学科的不同融合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前面说过,学术可以无边界而学科是有边界的。不同学科融合本身就是有制约的,而且融合不能消除学科边界和学科属性。本来人文学科被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冲击,在很多环节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如果不顾学科属性而无底线地融合,会进一步导致学科的不平衡并失去学科的个性,融合的前提是强化学科功能和特质而不是相反。应该利用人文学科的优势来增加其他学科的人文含量和精神指引,从而构成对物化主义、技术主义的约束。

科技人文的建设是大趋势,但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不能失去自己的特殊性价值。科技人文的创建要注意两个倾向。第一,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应该是最新最高层面的结合,而不能把生活常识作为科

^① 《“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3/t20210324_522219.html,访问日期:2021年3月23日。

学的表征来认识和认同；第二，融合应该是以我为主，以此来强化人文学科的功能与价值。“文科之新”首先需要打开文科的新视野，增强时代性和人类性。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都不能将对方单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融入。不能用罗盘看风水，也不能用火药来驱鬼，重在汲取其中包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诚如饶毅所言：“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①。所以，对于科学技术的实用主义传统也可能影响到新文科的建设。

就现阶段来说，大热的人工智能能否成人类思想的发展动力是存疑的，人文精神的批判性思维提醒我们对此应该表现出足够的清醒：“算法权力已成为社会、媒体和社会科学中一个熟悉的话题。在这些讨论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是，算法中渗透着规范性，而这些规范性塑造了社会。”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技术意识形态，“算法时代，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技术乐观主义成为了主流，甚至有学者断言人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算法’”。然而，“算法的外部性风险也随着其嵌入人类社会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加而累积”。算法“甚至利用人的生物弱点与内心欲望来控制‘自由意志’，正如赫拉利所言‘在算法入侵之前，时间不多了’。”^②网络世界已经从一个“相知不相遇”的信息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相遇不相知”的文化场域，算法和信息不仅仅是工具和环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评价方式。“人们关于信息的接受已经彰显为感官的刺激，依托理性原则建构起的算法逻辑正在扼杀逻辑本身，人之主体颇有沦为动物化、堕入思想蛮荒状态的危险意向。”^③

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所催生的现代人文精神，不断补充和调节技术主义道路所带来的种种疏漏和极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精神的大解放，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极度张扬。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人们的精神诉求已经让位于市场与技术。在技术化的浪潮面前，人文学科如何重回人文精神本身，回到人本身和人类本身，是人文学科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选择。当下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市场化、功利化，使人文研究远离了人文本身。我们忽略了对于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在强调人文学科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同时，相对忽略对人类形而上思想的思考，导致了一种技术主义实用主义的全民狂欢。如果所有学科都去服务社会、服务现实、服务经济，谁去服务理论、服务思想、服务未来和服务人类？虽说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自我学习，可以不再依靠输入的程序，但是人类输入的词汇最终还是制约着它的自我学习。没有民主自由词汇的输入，就不会产生这种精神的人工智能主体。基础研究的动力暂时可能没有功利的需求，只有自由的欲望，而突破的路径就是思想的创新。人工智能的思想价值取向仍然来自于人类的设计，所以其无论怎样发达，最终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人和人文精神的，任何理论建构和技术实践最终都要有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而不只是停留在束之高阁的逻辑主义和细枝末节的技术主义层面。

进入 20 世纪以来，技术主义浪潮接连不断，每次浪潮袭来几乎都是人文向技术致敬和靠拢，而不是相反。在这种融合中，我们发现人文的表现又不同于语言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功能性学科。后者往往被理工医科甚至某些社会科学所融入，形成了计算语言学、医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学科方向。而文学艺术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路向：主动向技术靠拢，尽可能地从中认领份额和寻找空间。当环境意识兴起，启蒙美学被生态美学替代；当城市化、工业化设计成为社会时尚，传统人文精神被技术美学替代；当网络时代到来，纸媒文学被网络文学替代；当人工智能流行，传统写作又被机器写作替代。我们说“替代”可能过于言重，但是融合过程的单向运动是明确无疑的，文学艺术自身总是主动的向技术献身，去拥抱新技术、新学科。无论是跨学科也好，还是交叉也好，理工科或者新技术极少向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艺术靠拢，至今“文学”或者“鲁迅有什么用”之问仍然是科技界对于文艺功能相当普遍的

① 饶毅：《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新华网，访问日期：2016年1月28日。

② 龙卫球：《算法时代的规制理论与实践》，张凌寒《权力之治：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序一，“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 <http://www.tsyzm.com>，访问日期：2021年5月20日。

③ 王冬冬：《相遇不相知：算法时代的文化景观重构》，《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揶揄。在新文科建设中,现在重提学科意识或学科启蒙仍然有必要性,其中不仅是一种学科公正的诉求,也是学科的一种自我反思。文科在新技术浪潮中如何面对,是一个极为严肃和严峻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写作盛行时,我们必须做出判断:人类是否要停止思考、停止想象和停止表达?“伴随人工智能叙事的技术优势,文学所必要的人本思想与人文关怀亦是要坚守的阵地。下一个研究目标将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对人文精神的影响与冲击,重新思考叙事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叙事方法的人文性与科学性。”^①

新技术与新文科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人文学科而不是使文科不像文科,失去自己的特性。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固有的批判意识、个性思想和浪漫情感能否延续,人类终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一个看似遥远但却紧迫的严峻课题。因此,我们应该把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讨论重新排入议程,因为当下时代更需要理性,也更需要人文精神,需要更广泛的价值传播。智能机器人不再依赖程序而是具有了自我学习的能力,但是关键是跟谁学习,学习了什么?2017年,特斯拉CEO马斯克与100多名科学家联名致信联合国,呼吁禁止人工智能武器。“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五角大楼就宣布在实战中使用了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系统。很明显,各个主权国家这方面都要争先恐后,就像上世纪的核竞赛一样,谁先搞出来谁就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的沉思尤其必要。2018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应该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总统委员会,来帮助制定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远景规划。”^②因为他认为“如同我不了解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的开发人员对政治和哲学也缺乏了解。从协调人工智能与人文传统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应该被列在国家议程中的最优先位置。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起步太迟了。”^③其目的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就是为了防止技术主义对于人和人文精神的伤害。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只是表现出兴奋,更要看到其中的危险。鲁迅1908年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尖锐的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因此,鲁迅针锋相对的提出“掇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④。同年,鲁迅又在《破恶声论》中强烈的表示出对于科学主义的忧虑,力倡“神思”与“白心”,反对物化主义和科技至上,甚至将主张者嘲讽的称之为“志士”抑或“伪士”,认为“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⑤鲁迅明显看出科学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制约,是一种技术主义道路末路狂奔的景象。

同样,1927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虚无主义危机是整个现代文明作为技术时代的危机。因为技术的本质首先是把‘存在’变成了某种可认识的对象、可理解的‘存在者’,然后是征服和控制它。技术就像电脑的格式化一样,把所有的一切都格式化了。这样一来,人的生存世界就没有了任何神秘性,没有任何意义的来源”。后来,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人制造自己,加工自己的时代,马上到来了。”^⑥1953年,他在《科学与沉思》中呼吁,“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权力,并且正在把这种权力最终覆盖于整个地球上……”海德格尔认为现在人类要的太多,已经忘记了“不要”对人类同样重要。从技术主义的兴盛,他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更广阔的视野,需要更通透的智慧,在热爱科学求真精神的意义上弘扬科学,同时也要认识到技术

① 张斯琦:《藏“叙”于“器”——文学叙事与人工智能》,《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3期。

② 孙周兴等:《我们今天越发要读海德格尔》,《长江日报》2018年9月25日《读十周刊》,记者李恂。

③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15日《河南》月刊第七号。

④ 迅行(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12月15日《河南》月刊第八号。

⑤ 迅行(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12月15日《河南》月刊第八号。

⑥ 吴增定:《〈存在与时间〉:中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路径》,《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期。

化的现代科学的求力一面,在这个层面上认识科学的局限所在,拥抱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①。

科技本身是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科融合因学科的不同,融合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不能把自然现象和生活常识作为科学技术本身来理解,学科融合应该是学科发展中最新最高层面的结合。所以说,融合本身就是有制约的,而且融合不能消除学科的公共边界和性质,“打破界限”不等于消除属性。如前所述,在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历史惯性冲击下,本来就已经被边缘化的基础文科如果放弃自己的属性而做无底线的融合,会进一步导致学科的不平衡并失去学科和学术个性。融合的前提是强化学科功能和特质而不是相反。在技术主义的浪潮中,人文学术可能是抵御和守护人文精神和人类主体性的最后力量和领域。科技人文就是利用人文学科的优势来增加科技的人文含量和精神指引,而努力对物化主义技术主义做一定的约束。人工智能本质上应该是为了人的完善发展,而人文学科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支持和改善;人类语言和人文情感的融入,使其更接近于完美人性。科技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应该以我为本或以我为主。新文科打开的不单单是科技新视野,更是人文精神的新视野。

更进一步地,学科融合发展是有主有次有限度的,新文科是相对于文科之旧而言的,那么学科之旧究竟旧在哪里?根本还是要学科意识,从学科跨界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改革,不是新建文科不是简单学科交叉或者融合。技术主义道路的行进不只是科技先导进而对于人文学科的占领,也包括导致人文学科自身发展中的知识碎片化以及逻辑形式主义的玄学化现象的出现,这已经成为学界许多人的共识,而观点的相同表明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真实性。例如,现在许多文科项目都是“什么什么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而有些课题更是在研究类似“懒婆娘的裹脚布是三尺长好还是二尺长好”“冬天比夏天冷”的琐碎问题。这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是长盛不衰的报刊研究热。重回宏大叙事,高扬人文精神,让文学回归于文学自身,让批评理论融入具体的批评实践,是文学之新的根本目的。

同时,“文科之新”还要思考旧有文科的向前发展与向后回归的问题,这是“文科之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

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是通过学科融合和自我更新,来实现思想的创新和学科的发展;而向后回归的路径则是返回原点和经典,是一种学科发展的反思和回望。“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中创新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丢弃传统,就是自断根基;不求创新,必然走向枯竭。新文科建设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于求变,要立足两个大局,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动适应并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文科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②对于有些基础文科现在不是急于如何新,而是思考如何“旧”,甚至是如何回归传统、回归原点。随着社会时代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有时候“守旧”就是“创新”。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娱乐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文科的阅读与传播呈现出多样化以及功利化倾向。人们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对象丰富了,但是在当下融媒体的时代,“丑、怪、俗”的网文和视频占据了自媒体的主流空间,各种网红直播广受追捧而一夜暴富,并且迅速成为青年文化的时尚热点。这种娱乐化、浅表化的文化时尚也极大地传染了大学校园和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文教育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文科学生中,不读经典、不读原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知识接受和知识消费过程极具功利性和快餐化。好一点学生看看名著的内容简介,再好一点的学生看看根据名著改编的影视剧,而不好的学生就索性百度一下记住几个关键词,中外经典原著往往在各大图书馆被束之高阁。如果作为一种个人价值取向这还不太使人关注,但是如果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或者从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机制上出现这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则实在让人忧虑。“‘新文科’研究与建设应有分

^① 孙周兴等:《我们今天越发要读海德格尔》,《长江日报》2018年9月25日《读十周刊》,记者李恂。

^②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发布》中国教育在线 2020年11月17日。

类思维,方能提高成果的可行性与有效性”。^①“新文科建设并非抛弃传统文科体系,而是在传统文科体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基础上,遵循文科发展规律,开展全面革新。”^②而其中最为简单的方式,那就是阅读经典与原典,这才是基础文科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基础。

无论是新文科还是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本质上是大同小异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现代性的人才,为民族思想提升质量,为人类思想扩大容量。因此,新文科建设最后的检验标准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人的精神品格。

The Road of Technic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Zhang Fugui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R.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hould include two ways of thinking. One is “liberal arts as a new discipline” and the other is “a novel rising of liberal arts”. The former is to create and form new liberal arts majors or dir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 latter is to rethink and adjus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existing liber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ow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New liberal arts” is not simply the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of new knowledge,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ethods. Its most fundamental thing is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discipline, innovate academic ideas and cultivate new talents. “The novel rising of liberal arts” refers to that the self-innovation and reflection of liberal art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basic liberal arts, achieve the linear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by integrating new technology.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 great chan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almost always guided by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every time the tide strikes, it is mostly the humanities that pay homage to and draw close to technology, and try their best to claim share and seek space. “Breaking the discipline boundary” does not mean eliminating the discipline attribute. Integ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m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humanities. For some traditional basic liberal arts, it should not eagerly pursue to be “new”, but to think about how to maintain “old”, and even how to return to tradition and origi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new engineering”, “new agriculture” and “new medicine” as a whole, and think about the new development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new disciplines.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Liberal arts as a new discipline”; “A novel rising of liberal arts”; Technicism; Origin classic

[责任编辑:邵世友]

^①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育》2020年第5期。

^② 隋建兴:《新文科建设的场域与路径》,《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